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壮志 ---- 评《中共绵阳市志》等写盐亭 1925-1935 年党史

玉龙

Recommended: 王德奎, y-tx@163.com

Abstract: 网名“山笋”的盐亭教师, 2012年2月21日在《山笋的博客》上写的《读中共盐亭县历史第一卷初稿》诗云:“蜀中兵匪连年战, 涂炭生灵盼救星。热血诗尧①传马列, 顽强文俊②勇斗争。红军过境推农运, 大众喜迎解放军。满纸波澜英烈史, 精神千古照来人。”诗后注解是: ①诗尧, 即袁诗尧, 盐亭县柏梓镇龙顾井人, 最早在盐亭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 1928年在反动军阀田颂尧制造的“2.16惨案”中光荣牺牲。次年5月1日, 中共盐亭特支建立, 有力地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②文俊, 本名汪克明, 四川宣汉县人, 加入中共后先后化名文俊、文超群、文柏林、张子云、李若愚从事地下工作, 曾任三台中心县委(曾迁盐亭龙潭子)书记、军委书记, 虽九死一生而未叛党。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的1925-1935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 在1950年的解放前, 原地下党的中共四川省委并没有就定下是“叛徒”案。而是随着革命的胜利, 四川省及各地、市、县的党组织重新改变后, 才发生的事情。具体地说, 与李井泉书记和胡耀邦书记有关, 但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只能从公开的材料, 去认识和研究。

[玉龙.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壮志 ---- 评《中共绵阳市志》等写盐亭 1925-1935 年党史. *Academ Arena* 2014;6(10):14-31].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3

Keywords: 盐亭县; 历史; 学生; 农民; 四川; 宣汉县; 绵阳市; 山笋

网名“山笋”的盐亭教师, 2012年2月21日在《山笋的博客》上写的《读中共盐亭县历史第一卷初稿》诗云:“蜀中兵匪连年战, 涂炭生灵盼救星。热血诗尧①传马列, 顽强文俊②勇斗争。红军过境推农运, 大众喜迎解放军。满纸波澜英烈史, 精神千古照来人。”诗后注解是: ①诗尧, 即袁诗尧, 盐亭县柏梓镇龙顾井人, 最早在盐亭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 1928年在反动军阀田颂尧制造的“2.16惨案”中光荣牺牲。次年5月1日, 中共盐亭特支建立, 有力地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②文俊, 本名汪克明, 四川宣汉县人, 加入中共后先后化名文俊、文超群、文柏林、张子云、李若愚从事地下工作, 曾任三台中心县委(曾迁盐亭龙潭子)书记、军委书记, 虽九死一生而未叛党。

山笋老师称: 汪克明“顽强文俊勇斗争”、“虽九死一生而未叛党”。这与事实不符。汪克明制造了1925-1935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即现在的高灯镇), 解放后又被定为“叛徒”案。汪克明和英勇就义的申秋成、何增甲等那300多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 谁是真假“叛徒”, 解放后60多年来一直是盐亭革命老区群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长期涉及很多讳莫如深的政治矛盾, 以

及不是组织派的专案调查, 想说的话虽然向有关领导同志反映过, 但并未给予答复。现在《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历史(第一卷初稿)》等书已正式出版, 汪克明和英勇就义的申秋成、何增甲等那300多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 谁是真假“叛徒”, 可以依据《中共绵阳市志》等的书面材料进行研究,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应该说, 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的1925-1935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 在1950年的解放前, 原地下党的中共四川省委并没有就定下是“叛徒”案。而是随着革命的胜利, 四川省及各地、市、县的党组织重新改变后, 才发生的事情。具体地说, 与李井泉书记和胡耀邦书记有关, 但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只能从公开的材料, 去认识和研究。

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从命令中可以看出, 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1949年5月23日, 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 明确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 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 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 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 一路由贺龙率领经

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之后，李井泉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直到“文革”。而解放军入川时，胡耀邦只是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及重庆市，加上原有的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均直属于西南局。川南行署的驻地在泸州市。川北行署驻地南充市，川东行署驻地重庆市，川西行署驻地成都市。西康省驻地康定县（后迁到雅安）。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行署区合并为四川省。汪克明出生的宣汉县和英勇就义的申秋成、何增甲等那300多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出生的盐亭县，都属于在胡耀邦主政的川北行署区内。但从1984年以后平反的国共两党的盐亭籍高层人员，如任望南、曾子云、刘仰高、虞国政等四人看，任望南、曾子云是1949年底在成都投诚，后被押回盐亭枪决的国民党将官；刘仰高、虞国政是1950年解放后在成都川西行署区被捕进监狱，1984年以后才解除“特务”、“叛徒”怀疑的中共人员。

川西行署区是中国1950年至1952年存在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川西行署区划分为茂县、绵阳、温江、眉山四个专区和成都市。川北行署区是中国1950年至1952年存在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川北行署区下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四个专区。达县专区驻达县，辖8县：达县、宣汉县、开江县、平昌县、南江县、通江县。遂宁专区驻遂宁县，辖9县：遂宁县、潼南县、乐至县、三台县、盐亭县、蓬溪县。1952年6月底，中共中央电令胡耀邦到中央工作，离开四川。

著名作家白桦先生写有回忆解放初李井泉和胡耀邦的文章说：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住处参加舞会，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等，还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不跳舞，要找人陪他打桥牌。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阎二人神情阴郁、哼

哼哈哈，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李井泉曾经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

李井泉（1909-1989），江西省临川人。1926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革命。1927年组织农民参加南昌起义队伍。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调红四方面军工作。1936年6月抵达陕北。1949年赴四川，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说起李井泉和张国焘，赞扬的都是李井泉与张国焘作斗争。那是在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一些受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竟然围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德、刘伯承都主张：“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上栗人，竟然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李井泉进行抵制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说话了，他们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张国焘一怒之下，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影响没影响到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盐亭县委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呢？1932年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比鄂豫皖更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以1935年9月在川西为例，张国焘下令将红33军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集中关押，随后将二百余人陆续处决。

2002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记载，盐亭人的共产党员候伯英（1907—1935）、范弘先，1928年在三台国民革命军第29军政治部任宣传员，秘密成立中共三台小组。第29军政治部主任最先是盐亭麟瑞人袁诗尧，1916年张澜讨伐袁世凯，在南充招募学生军，袁诗尧毅然从军。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张秀熟被选为理事长，袁诗尧被选为副理事长。1920年袁诗尧与巴金等人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半月报》。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王右木任《新四川旬报》编辑，袁诗尧任经理。1921年袁诗尧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是罗瑞卿的老师。1925年袁诗尧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回盐亭任教育局局长，创办盐亭国民师范学校和盐亭县立初级中学。1927年1月到重庆，见到中共重庆地方委员

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的四哥），经组织决定派袁诗尧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到三台田颂尧的 29 军军部，作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田颂尧的高级顾问。同年 7 月中共四川省委又调袁诗尧到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 年 2 月袁诗尧被敌人杀害于成都下莲池。1929 年中共三台特支书记候伯英回到盐亭，同范弘先介绍盐亭师范班学生虞国政入党，同时秘密建立中共盐亭特支，由范弘先任书记，组织虞国政，宣传候伯英兼，属三台特支领导，候伯英重返三台。

1930 年范弘先离开盐亭，盐亭特支书记由虞国政继任。盐亭有个特殊情况是，何拔儒和张澜、陈润霖、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黄兴，是 1903 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时认识交往的同学和结交的好友。1913 年至 1917 年受陈润霖、杨怀中的推荐，以及张澜的派遣，何拔儒曾在毛泽东（1893-1976）就读的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学校做老师，和毛泽东有过密切交往。何连光是何拔儒四弟的儿子，2014 年我们采访何连光。他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的。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的经历是，1917 年何拔儒受张澜召唤返回四川，这时杨怀中也离开长沙到北京。1918 年何拔儒到张澜的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他已经能直白地与张澜私下讨论，他和杨怀中心中拥有的那张打造多元一体和平崛起的家乡建设实践的后继人才的宏伟蓝图，以及把四川家乡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的办法。由于有在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的经历，他与张澜招聘的南充中学教师中的袁诗尧、张秀熟等也有了认识和交往，而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

张秀熟（1895-1994），四川平武县人。1921 年任南充中学教务长，教员中就有盐亭人袁诗尧、杜佩绅等。1925 年张秀熟在重庆结识共产党人萧楚女，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出任川西特委书记并兼任中共成都特支代理书记，并到江油省二中建立中共省二中支部。1928 年张秀熟被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同年被捕，1936 年获释回平武。1937 年经组织在川军刘湘部队担任顾问。1940 年经组织决定回家乡平武隐蔽，任平武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建国后任成都树德中学校长，川西区教育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

南充私立存古学校和南充中学是什么关系？

20 世纪初极贫极弱的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就业，云集在重庆、南充、成都等地的王右木、张澜、杨闇公、吴玉章、袁诗尧、何拔儒等人，他们想到的存古，已经不是存孔孟之道，而是像上古嫫祖一样开发丝绸经济带。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已经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也要走的社会主义。在四川家乡中学时代的邓小平同志，那时也受到过这些思想的熏陶；这些思想也包容在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例如有人说，张澜于 1920 年担任校长的南充中学，不是现在的“南充中学”，而是位于鹤鸣山麓的白塔中学。张澜 1904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府址在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 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 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 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1911 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爆发。1912 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并在此时发起创建了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3 年 4 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 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 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 年离川留居北京。1920 年张澜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并兴办职业教育。1921 年张澜先生首次出任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1924 年张澜先生将南充县立中学与南充县乙种实业学校、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合并，开设了普通、师范、工业、农蚕、医学五部，并在校内修建蚕房、烘茧房和丝厂作为学生实习的工场。1931 年张澜先生重返家乡，再度出任蚕丝校校长，并将已分为两校南充县立中学和南充县立初级实业中学合并命名为南充县立职业学校。

再说由于何拔儒与毛泽东有过师生经历，后来何拔儒也十分关注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和红军长征的革命活动。何增甲（又名何登甲）和申秋成（又名申家成）是何拔儒在盐亭存古学堂教过的学生，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他们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 多共产党人，1935 年在高灯镇遭大屠杀中遇害，而得不到解放后的正面评价。当地亲眼目睹过被害场面的群众有不同的看法，说他们是英勇的，在临砍头时还集体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在梓江榨溪河龙潭革命老区民间群众中久久流传。这次屠杀之惨烈，如高灯镇当时的名称叫“塔泥坝”，敌人屠杀了何增甲和申秋成等 300 多共产党人之后，还放火烧毁了塔泥坝场镇的全部房屋，把塔泥坝场镇改名为“高灯镇”，从这一片较平坦的地段，搬迁到约一公里之远的灯杆山斜坡上，重新建场镇。

而这次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的毁灭性打击，也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有关。本土人组织共产

党，是为了建设好国家，建设好家乡；而上层的张国焘，却是为在共产党内个人掌权。由此他与四川省委中拥护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有矛盾；也有受他蒙蔽被派到盐亭革命老区县作地下党的领导，而与盐亭本土拥护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的何增甲和申秋成等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也有些矛盾。

1991年出版的《盐亭县志》记载：1929年“五一”劳动节，“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弘先任书记，余国政（虞国政）任组织，候伯英任宣传。10月，成立天垣申家沟支部，书记申家成”。因候伯英、范弘先、虞正国是盐亭北面人，候伯英、范弘先主要在三台工作、虞正国是学生，盐亭特支成立不到半年，在盐亭南面，申秋成（申家成）是盐亭县农村基层最早组织的本土地下党的支部，而在盐亭以后成立的所有支部，都是在1930年7月以后。这个事实说明。在盐亭县南面梓江梓溪河畔天垣地区，已经有了共产党的人脉基础。

这与何拔儒、袁诗尧、刘仰高等先参加共产党有关。盐亭县最先参加共产党四川组织的袁诗尧、刘仰高（1893-1968）等中，袁诗尧（1897-1928）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回盐亭任教育局长，创办盐亭国民师范学校和盐亭县立初级中学，但他并没有在盐亭多发展何拔儒以外的党员，建立中共盐亭特支，原因何在？这就是像袁诗尧这样一些以个人身份在外地加入了共产党的盐亭本土人，有一个坚持类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家乡的想法，这和盐亭县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非常结合的。但与这上级像张国焘这类领导的想法有差异，所以他们宁愿以个人身份在盐亭宣传组织进步群众活动，以等待时候。

这个时候直等到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后，共产党员于祯、杨鹤鸣、邓跃宗等从成都转移到三台、绵阳，分别打入国民党第29军，发展党员和建立党团组织。于祯、杨鹤鸣在三台29军政治部发展了宣传员盐亭人侯伯英、范弘先入党，1928年4月，建立了党小组。1928年8月，中共射洪县太和镇军支书记张绵祜来三台潼川高中任教；同年在北京入党的谭襄城回到三台，也在潼川高中任教，他们在城区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并于1929年2月在三台建立特支。特支属省临委领导，书记侯伯英。5月1日，范弘先又在盐亭建立的特支。可见袁诗尧、何拔儒把组织盐亭本土地下党的支部工作，交给了与上级领导的想法更合拍的一些人去担当。这与党内当时斗争复杂，也有关。

1928年刘仰高（1893-1968）参加共产党，他是盐亭老县城人，1912年考入四川陆军学堂，作过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1929年受省委派遣，到遂宁组织武装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副参谋长兼五团团团长。1930年被派到上

海中共中央主办的训练办学习。学习结束后，受命赴洪湖任红六军参谋长，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斗争。1932年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在盐亭田颂尧部策动兵变，担任交通员。他凭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营长的声望，又与当地上层人物和袍哥组织联系密切，在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成功谋取了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职务；护送罗世文、廖承志等省和中央领导过盐亭，先后从地方输送200多党团员和专门人才到川陕区工作。1938年在成都被邓锡侯逮捕，刑期15年。1949年国民党发布大赦出狱，与中共党组织脱离。1968年病卒于温江。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恢复他党籍。

由于刘仰高有这些经历，类似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写到的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共产党人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等的类似情况，也告诉了与他私下关系、交往不一般的何拔儒一些。例如，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红25军74师师政委，1932年11月下令将74师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抓起来，全部杀掉。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召开错误的“肃反”。

何拔儒了解的这些事，是在盐亭田颂尧部29军围剿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之前。何拔儒所闻的还不仅这点，当然他也深知，给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等，谈他听到的中央苏区那时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更是讳莫如深的。

何拔儒知道，以毛泽东为书记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井冈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客籍矛盾。土地革命开始后，井冈山形成了土籍、客籍。对井冈山的“土著居民”来说，从异地迁居而来的客籍人是“入侵者”；对客籍人士来说，为了生存自卫的需要，就有武装自卫，这让毛泽东也觉得很不好处理。湘赣边特委利用假称开会攻打吉安，于1930年2月21日把袁、王杀了。袁、王被杀后，袁、王余部立马投靠了国民党，而使毛泽东在赣西南苏区结合中央左倾肃反乱打乱杀AB团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当时发生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敌我矛盾，要求红二十军拉到中央苏区，随后以召开会议为名，把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500多人全部集中到于都县的平安寨缴械，最后全部枪杀在平安寨，红二十军随之解体。

现在知道，袁、王问题得到公正解决，是直等到 21 世纪袁、王才被追认为烈士。如果把地下党领导人袁诗尧和侯伯英，与何增甲和申秋成作比较，他们都是盐亭本土人，袁诗尧和侯伯英主要是在盐亭县外领导革命，何增甲和申秋成是一直在盐亭本土农村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领导革命。集体屠杀何增甲和申秋成等 300 多共产党人的，主要是国民党田颂尧的 29 军，而袁诗尧和侯伯英曾在田颂尧的 29 军军部作过地下工作，这当然也使敌人恨透了袁诗尧和侯伯英。扑灭盐亭革命老区 1925-1935 年地下共产党人和领导的革命武装，虽然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执行的，但难道没有四川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也残酷带来的伤害？

1929-1935 年间，盐亭革命老区县有近 10 万人次参与了游击队、交通线及支援前线等工作。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特别是三台柳池暴动失败后，省委将三台中心县委迁至盐亭龙潭子，这里临近榉溪河，上是珠璠沟，下是天垣场。在梓江、榉溪河流经的八角、金孔、黄甸、玉龙、两河等区乡，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 24 个乡镇建立了 33 个党组织、30 个团支部、100 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 4100 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 1200 余人。但上世纪 80 年代，1935 年被盐亭田颂尧部 29 军围剿，在高灯镇遭大屠杀英勇就义的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 多共产党人“叛徒案”浮出水面，这和 1949 年以后李井泉书记有没有关系呢？李井泉虽能与张国焘作斗争，但也支持过张国焘在红军中开展扩大化的错误的“肃反”，这有联系吗？

白展云先生说他是曾近距离观察过李井泉的人。我们认识西南财大校长办公室主任白展云先生，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思维科学研究会筹备的时候。白展云 1930 年生，山西兴县城关人，1940 年考入兴县第一完全小学高级班，1943 年高小毕业后，进入晋绥行署和兴县一专署任文教干事、剧团演员、文化教员。白展云向我们讲：1949 年他随军进入大西南后，曾担任过四川师范学院的宣传部长和四川省委领导杜兴垣同志等的秘书。杜兴垣（1914—2011），福建霞浦三沙镇人，1936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省立福州乡村师范任过教员。1937 年到延安，1938 年加入共产党。白展云说：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毛主席曾提出，曾经带过兵、但部队已被打散的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可以到敌占区去发展游击队，能组织起部队的可以重新恢复番号和职务。

1927 年李井泉就曾组织起农民武装，参加过周恩来、叶挺、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那时他

也认识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南昌，反对周恩来的立即进行起义的决定，主张推迟起义争取张发奎，不然会失败。张国焘遭到否决，南昌起义打响。但后来南昌起义失败了，李井泉带领的部队被打散。他对张国焘有些想法，但仍坚持参加革命。1930 年代末李井泉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带领杜兴垣等一批革命青年，从延安到敌占区的晋绥地区作地下工作，以晋绥地区兴县师范学校、兴县第一完全小学为中心，在教员和学生中发展起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后来李井泉组织起的部队，大部分以这批人为骨干，与晋绥党政军的其他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等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白展云说他认识杜兴垣，就是杜兴垣当他们教员作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都称李井泉为“李政委”。李政委对自己贴心的部下要求也十分严格，白展云说从兴县就跟随进川的李政委比较信任的一位同志，已被他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1957 年反右斗争中只因他建议李政委，不要把成都市川剧团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年青女演员因说错一些话划为“右派”，李政委也就把这位宣传部长一同划为“右派”，并把这位同志遣散回兴县老家农村。这让他们很多跟随进川的兴县老乡，心里对李政委有意见。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给一批“右派”平反，这位同志被落实政策回到成都，他们一些兴县老乡才为此跑去庆贺。

高如星（1929-1971）是白展云在兴县读小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也是天才的作曲家，《九九艳阳天》就是他 24 岁写的《柳堡的故事》的插曲，此歌曾到处传唱。他还写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20 多部电影音乐。1964 年高如星相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北京电影厂演员王云霞。王云霞是共产党员，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只因受北影领导的指派，她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后因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案的牵连，习仲勋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王云霞也变成“内控”人员，不让参加任何活动。这也起因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陈伯达说：“小说《刘志丹》的事，是阎红彦同志提出的，他说这部小说是写高岗的，还责备习仲勋同志支持了这部小说。”党的历史上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内部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看过《刘志丹》送审样书，认为小说涉及西北革命历史问题，不赞成出版。1962 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有些报刊连载部分章节，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在 1962 年 9 月 8 日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

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

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人，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有人说，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件事直到2003年还没有完，如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是政治矛盾，但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是令人费解的。

谁划的盐亭革命老区 1935年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的“叛徒案”，同样令人费解。

盐亭县原县委党史办主任江渭川先生曾著文《盐亭地下党对川陕苏区建立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中说：川陕苏区，是我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1933年初，从鄂豫皖战略转移进占陕南宁强、西乡和川北通、南、巴后，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县、区、乡、村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总称。即主要受张国焘领导。到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原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为5个军8万余人。1929年5月建立了“中共盐亭特支”，1933年7月建立了“中共盐亭县委”，9月建立了“中共龙潭区委”，11月三台中心县委迁来盐亭龙潭，年底省委决定将阆南县委领导的“富驿区委”划属三台中心县委领导。并先后在龙潭、玉龙、三元、麻秧、三星、城厢、毛公、章帮等地建立了支部27个，其中学校支部3个，县保安大队军支部1个，潼保马路支部1个，共有党员129人。为保卫苏区、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以龙潭为中心，波及到全县20多个乡镇。参加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组织达数千人。在斗争中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挫折。

1934年夏秋之间，友连友，亲连亲，先后在

龙凤、玉龙、高灯以及射洪的天仙、大佛寺等盐射边境一带，发展农会小组20余个，会员60余人。早在1931年4月至7月，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入川北之前，盐亭特区行动委员会根据四川省委“关于组织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和“关于工农运动的决议”精神，组织发动了潼保马路三千多人的几次大罢工，还组织了600余人的青工队，准备拉上山去打游击，震惊了29军头目及国民党官府。问题出在汪克明。

汪克明（1909-1984），四川省宣汉县人。《中共绵阳市志》附录“人物简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说：汪克明化名李文俊、文俊、文柏林、文超群、李若愚、李家智、张子云。高中文化程度。1928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成都龙泉特支书记。来自通南巴根据地方向的汪克明，崇拜张国焘。1933年3月任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5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6月逃脱后又回到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组织“工农前卫团”，任团长。10月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1936年夏登报脱党。解放后，在重庆柴油机厂、简阳拖拉机厂任职，1984年逝世。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桦溪河畔石狗场（即龙潭子附近的五龙场）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员，在这位执掌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工农前卫团”任团长的汪克明（李文俊、文俊）手上，惨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都成了“叛徒”。

盐亭革命老区从1925年至1935年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革命成果，遭到毁灭打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才开始恢复组织。而在遭毁灭性打击前，汪克明两次遭国民党逮捕，两次顺利活下来，解放后还得到很好照顾，真是奇迹。这也使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桦溪河畔龙潭地区，亲身所闻所见的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有人制造了盐亭革命老区的“千古奇冤”。《中共绵阳市志》附录“人物简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是这样介绍一位“叛徒”的：何登甲（？），四川省盐亭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任盐亭龙潭地区农会负责人，1933年3月任共青团盐亭县特支书记，7月任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委员，游击大队队长，11月任龙潭区委书记。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何登甲即何增甲，是1935年在塔泥坝（高灯）300多共产党员英勇就义者之一。他死后无人为他说清楚事实真相。1980年代盐亭县农业局办公室任元洪主任说，何增甲是他的姑父，八角人，1935年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后，8岁的儿子失踪，妻子跳堰塘自杀。而申秋成是玉龙区天垣人，据天垣申家沟的人反映，申秋成也是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他的家人也被全弄死光。如果是共产党的叛徒，出卖

党，出卖同志，遭千刀万剐，遗臭万年，也是应该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野坂参三，活了一百多岁，长期当过日本共产党主席。苏联解体后，档案暴露野坂参三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本共产党查清后也把野坂开除出党。说明是共产党真正的叛徒，百岁也难逃法网。然而解放后在我党历史上，也有错打“叛徒”的时候。例如刘少奇同志在“九大”上，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改革开放后才给予平反。即使真叛徒向忠发，2013年《南方周末》发表《向忠发死亡之谜》一文，还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实事求是地对他叛变告密，具体有哪些？不是事实的有哪些？做说明。

更有陈忠实的著名长篇小说《白鹿原》，暗写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斗争。其中红军36军的姜政委，是中央派去的，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活埋共产党员白灵。他还一意孤行，强迫红36军从陕北根据地南下去攻打敌人比自己强大的西安城，企图想让敌人消灭红36军。其次是白灵的大哥白孝文，当了宪兵做了白鹿原地区县国民党伪保警保安团大队长。解放前夕，黑娃作为解放军的指挥员，带兵攻打白鹿原地区县城。为减少伤亡，黑娃做白孝文的工作，希望他带兵起义，个中原因，是黑娃的父母曾是白家长工，对白孝文，黑娃从小认识。白孝文被争取后，白鹿原地区很快被解放。但革命胜利后，白大队长以革命干部的身份，暗向上级贺龙同志写信，诬告黑娃是土匪，曾杀害共产党员。贺龙同志弄错，嘉奖白孝文，批准枪杀黑娃。解放后，周恩来同志也让那位有错的红军36军姜政委，改名换姓消失在革命队伍中。《白鹿原》评矛盾文学奖前，第二版这两处文字被删去后，又再版发行。《白鹿原》写的虽是小说故事，有些却与盐亭革命老区类似。

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考证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地下党1935年在塔泥坝300多共产党员英勇就义，不是为“叛徒”翻案，而是为了弄清真相。《中共绵阳市志》一书前面《凡例》说，绵阳市党史涉及的地域范围是涪城、游仙、江油、安县、三台、梓潼、盐亭、平武、北川等9个区市县。人物入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间是从建国前1921年至1949年。收录的条件是，大革命时期为支部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特支书记以上和少数影响大的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心特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为县（工）委书记以上。以这个条件研究绵阳市本土人，和外地及全国各省，在此期间作领导的人数比例，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只取绵阳市中人口最多的三台（147万人）、江油（89万人）两个县市，与人口比它们少的盐亭县（62万人）作比较。其次，外省只取山西省作参照。《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共收录44

人，其中盐亭8人，三台3人，江油0人，山西省0人。可见盐亭是绵阳市本土，和外地及全国各省中人数最多的。但被该书归为“叛徒”的就有4人，占到一半。

如果1980年代不平反，除牺牲在外县的，在盐亭本土领导革命的都被认为是“叛徒”。原因何在？是自毁党史。盐亭本土不是革命“叛徒”县，解放后还能证明。因为《中共绵阳市志》接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时间是从建国后1950年至1995年。收录的条件是，市（地）委正副书记；历届市（地）委委员，纪委委员和市（地）委工作部门、派出机构任正职的，一共收录45人，其中盐亭2人，三台1人，江油0人，山西省15人。盐亭还是绵阳本土多的。

以上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绵阳地区及至四川省，是我国最早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初到俄国十月革命前，王右木、袁诗尧、杨闇公、吴玉章、张澜、刘仰高、何拔儒等人，已经在开始研究中国如果信奉马克思主义，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他们说的存古复兴，也类似像上古嫫祖开发丝绸经济带一样的搞和平与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们仍认为，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即使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中国也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称为“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爆发，共产党人中的大多数已经看到或觉得：中国已经不能绕过“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但仍然认为这只是阶段的，中国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盐亭有盘古和嫫祖传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全国存古学堂最早20世纪初就在盐亭普遍建立，这类思想被袁诗尧、刘仰高、何拔儒等人，结合盐亭实际传播到基层。为了抗日，支援抗日，发展当地落后的乡村经济，他们不主张用恐怖的，晚上偷袭的，全家抢光的办法，打击基本符合当时民俗认可的富裕人家，因此在1929年到1934年大发展苏维埃农会期间，很多富裕人家也不反感农会。

所以盐亭革命老区梓江梓溪河流域地区，农会几乎成了一片红。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了保卫农会，抗击国民党军队、保安队骚扰，维护乡村经济发展和秩序的革命武装。这支游击队主要抛头露面的地下党领导人是申秋成（申家成），他是盐亭农村第一个建立党支部的书记，威信高，组织能力强。何增甲（何登甲），人年轻，开始是申秋成的助手。这就是为什么三台中心县委在三台站不住脚，要迁到地下党领导的龙潭革命根据地。从绵阳党史办写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绵阳地方组织沿革》中，可整理出大革命时期盐亭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沿革情况。

这是在 1929 年至 1935 年，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受到敌 29 军的残酷清剿，先后逮捕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和外围革命骨干成员上千人，共约有 800 人死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同时一大批盐亭籍战士，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一)1933 年 3 月，余宏文调离三台中心县委，省委先后派汪克明、郭仲纯、袁牧华、翁国强、刘仰高来三台开展农运和军事工作，组成中心县委并设常委。书记：汪克明，兼军委书记。常委：刘克谐（10 月调省委）、郭仲纯（郭嘉周，6 月被捕）、袁牧华（绰号袁胡，秋后转移）。委员：胡曼石（4 月赴川陕苏区）、张天觉、刘仰高（10 月增补）、翁国强（兼军委秘书，10 月增补）、谌伯龙（兼秘书）。1933 年 7 月，三台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选择接近川陕苏区的盐亭龙潭子山区准备游击活动，建立了盐亭县委和龙潭区委。1933 年 11 月三台白色恐怖严重，三台中心县委迁盐亭，中心县委补充了胡伯章、赵济舟。1934 年 5 月，赵济舟被捕叛变，致使汪克明被捕，押送绵阳。6 月，汪克明在绵阳逃脱，又回到盐亭继续活动。胡伯章也被捕叛变，刘仰高转移成都。中心县委又补充了王明寿、何光明。同年 10 月，汪克明在龙潭地区组织抗捐，主张采用极端“恐怖”手段。汪克明再次被捕后，三台中心县委及所属组织被完全破坏。总起来是：书记：汪克明。委员：张天觉、刘仰高、胡伯章、赵济舟、王明寿、何光明。

(二)盐亭特支，1929 年夏，三台特支书记侯伯英和范弘先回盐亭建立特支。1930 年 10 月，三台北区农民盐工暴动失败，邹风平、许本达等 5 人转移盐亭，特支改组，书记：范弘先（1929—1930.1）、虞国政（1930.1—1931.2）、邹风平（1931.2—1931.3）。盐亭行委，1931 年 3 月盐亭特支改为行委。

负责人为：许本达（1931.3—1931.8）、虞国政（1931.8—1933.5）、王介儒（1933.5—1933.7）。盐亭县委，1933 年 7 月成立盐亭县委。11 月，县委书记何什民（1933.7—1933.11）被捕，县委解体，所属的龙潭区委由三台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盐亭龙潭区委，1933 年 9 月龙潭区委建立，先属盐亭县委领导。11 月后归三台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书记：何什民（兼，1933.9—1933.11）、何登甲

（1933.11—1934 年春）。富村驿区委，富村驿区委原属南部县的组织，1934 年 3 月，划归三台中心县委领导。书记：张友志（1934.3—1934.4）。

《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收录地下党领导人的 44 人，其中盐亭 8 人是：刘仰高、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侯伯英、袁诗尧、虞国政。《中共绵阳市志》归为“叛徒”的 4 人是：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这

中间并没有申秋成。而作为盐亭革命老区梓江梓溪河流域地下党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申秋成为什么没有进入盐亭地下党领导人的名录？就像有人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领导人内部阎红彦与习仲勋存在政治矛盾一样，申秋成与汪克明也存在政治、理论矛盾。例如，申秋成早先在盐亭存古学堂从事地下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期间，深受袁诗尧、刘仰高、何拔儒等老师谈论类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他比较倾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结合建立游击队，他主张抗日救国，保乡安民。对于迎接红军，申秋成坚持不等于迎接张国焘南下，而应是跟毛主席北上抗日。这是汪克明崇拜张国焘等极力反对，并不断向上级反映的问题。由于申秋成是本土人，他组织起的 1000 多人的游击队员，也是本土人，自然接受申秋成影响的人。

申秋成与汪克明存在的政治、理论矛盾，在盐亭县委、龙潭区委和游击队的一些骨干成员中也有影响。何增甲是申秋成培养起来的游击队骨干，人也年青，但他在申秋成与汪克明的矛盾争论中，更多保持中立，而被汪克明看重，给他更多的任务。刘仰高和虞国政等骨干成员更多倾向申秋成。刘仰高和申秋成很早就认识，而且关系非常好。1932 年刘仰高在湖北洪湖任红六军参谋长转回盐亭后，打入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谋取到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同时在 1933 年 10 月增补为三台中心县委的委员。刘仰高担任地下党交通员，他从盐亭输送的 200 多党团员到川陕区工作的人中，很多就是跟随申秋成的游击队员。如梓溪河地区天垣人的共产党将军胥树香，解放初曾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盐亭富驿的红军团长卢发社，是解放军抗日的革命烈士。据胥树香将军在 1950 年代一次回家探亲时说，盐亭在解放后还有二、三十位在世的共产党的将军干部。

当然申秋成与汪克明的一些矛盾，也影响到一些人参加到国民党的抗日军队中。例如 1998 年 6 月首届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国共两党曾浴血奋战过的将军在嫫祖故里同游，我们采访台湾来的邓永树将军，他是盐亭梓江梓溪河地区玉龙镇人。邓永树说，在台湾还有一些盐亭出生的将军，如天垣人的胥立勋将军就是他的朋友。他说盐亭，也出有二、三十位国民党的将军。

江渭川先生和绵阳市党史办的有关文章说，1933 年底，汪克明参加了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传达了“赤化全川”的战略计划。鉴于斗争的需要，省委决定将阆南县委所辖之富村驿划与三台中心县委领导，并决定三台中心县委迁盐亭，以地理条件优越，进可攻，退可守，群众基础好的龙潭地区为中心，开展抗捐、抗粮、抗债，破仓分粮，组织农

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支援红军，迎接红军。

这次会议，责成三台中心县委一定要按计划和时间完成。这项布置系绝密，不许传达，只能在暴动时作行动方针。1934年4月，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刚抵盐亭县城欲去龙潭，让赵济舟（中心县委成员，县委秘书）先去北街联络站。

赵济舟却遭被捕，出卖了汪；汪克明也被捕。据汪说，他自己是在被押送绵阳后，6月择机逃走，重返龙潭，继续领导工作的。当时中心县委因计划1934年9、10月间支援红军渡江，甚为迫切。为强化斗争，汪克明着手整顿游击队，需要类似张国焘在红军中开展的扩大化“肃反”。即避开一些动摇分子，以贫雇农为基础，成立农民武装“工农前卫团”。这也是汪克明和申秋成（申家成）直接有些矛盾的开端。汪克明来龙潭革命根据地后，组织发展也很快，不到两个月，原有1000多人的游击队又增加发展了300余人，改为汪克明任团长，王明寿任副团长，何光明、何登甲任大队长。宣布纪律，严守机密；强调要有“枪弹战斗，人亡枪亡”的战斗精神。新的“工农前卫团”成立后，由邓象舆组织训练，汪克明亲自带队演习，并讲授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战术。大搞昼伏夜出，实地加紧训练。

1934年8月，“川西北抗捐大同盟”在龙潭筹建。这个组织与原农协会不同，只要愿意抗捐抗粮的，都可以参加。当时它是农协会的外围组织，并刻制了“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方形木质大印一颗。计划以这里为根据地，在川西北地区展开抗捐抗粮的农民武装斗争，迎接张国焘的南下。“工农前卫团”的成立和“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筹建，这时全县新增计有党员一百余人，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组织新增计约二千余人。龙潭地区因党、团员多，农协会及其武装组织普遍建立，使这里纵横二十华里，成了党领导下的赤色地带，也成为了盐亭的革命中心。而早在1932年5月新丝上市时，梓江、梓溪河畔地区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抗债斗争，在麻秧抗债斗争取得胜利后，接着玉龙斗争了刘汉升。

玉龙场镇陕西财主开的“万盛源”、“广盛守”、“兴盛守”三个钱庄，因抗债团发动群众拖贷不还，加上物价高涨，货币贬值，使三个字号相继倒台。永太场斗争恶霸何炳文，场内场外，贴标语，发传单，群众高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青年们团结起来，担起救国救民的重担”等口号，在农村喧赫轰动一时。

1933年，三台中心县委的工作重心向盐亭方向发展，当时的游击队才改为“工农前卫团”农民

武装的。1933年10月，盐亭县委决定打击民愤极大的土豪杨寿堂，先派胥伯安去查看地形，探明路径。到了约定的晚上，由邓象舆、何登甲带领30多名游击队队员，齐集保安场（现三元乡境内）的杨寿堂家外，并派人卡住通往黄甸和三元方向的交通要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马刀劈开大门，疾步冲进内房，将杨寿堂捉住，捆在柱头上，搜缴出大洋一百五十元，并将搜出的放高利贷和租佃的各种契约踩入水田里，然后把事先写好的杨寿堂的罪状贴在墙上。这次地下党把缴获的钱，全部作革命经费，买油印机、腊纸和电筒等物，并计划购置枪支弹药，装备自己，斗争如火如荼。

1933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游击队在塔泥坝（即高灯）执行“打狗法”（指打土豪劣绅）未成，决定这晚在大松垭召开队员会。组织规定：不许打灯笼，不许打火把，滚了岩也不许叫唤，参加会议人员以“山那边”为口令，答对者方能进入。会议中心议题是：抗捐抗粮，迎接红军到来，并部署在第二天石狗场逢场时，一定要有行动。要求行动时，游击队员以前大襟的门扣不扣为识别标记，自带武器、顽石均可。到了石狗场逢场这天，恰逢29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来收伙饷款，游击队员陈朝发趁人多拥挤之际，将藏在身上的铁锤取出，把吴头部打得鲜血直流。这时，全街的人拥来了，团丁闻讯赶来，陈朝发被抓。当时游击队派人营救，因团丁荷枪实弹，警戒甚严，营救未遂。从打杨寿堂和提款委员，游击队士气高昂，派了坚强的战士深入国民党的各团防和保安队中，以便收集情报，掌握武装。同时党组织还派了何光清、杜有云、赵明训到三台去参加军阀田颂尧的军队，准备打通关系，好夺武器，组织兵变暴动，与通南巴红军接头。

1934年，龙凤、高灯、三河一带的农民运动，也连战连捷，声势很大。大约是6、7月间，龙凤农会汇同大佛寺农会，在夜深人静时，派出武装人员化装袭击了高利贷盘剥者胥顺的家，焚毁了他世代剥削佃贫农的地契和高利贷借据，并搜缴了他部分财产，狠狠打击了财主的嚣张气焰，大长农民的志气。同年7月的又一天，龙凤财主王廷国，派出狗腿子到佃户家去收买蚕茧，茧子装走后，却分文不给，声称要扣租抵债。农会得到消息后，派人找王廷国进行说理斗争，结果斗得王廷国被迫交出应付的茧价款，农会将款转交了售茧佃户。

“工农前卫团”的农民武装，相机四处出击，打击官绅财主，军阀官府惶恐不安。这都是1933年3月，四川省委为配合通南巴苏区红军的斗争，派汪克明到田颂尧军部所在地三台后，加强盐亭县委领导，组织暴动和游击战出现的新高潮，吸引田颂尧军部来攻打盐亭龙潭革命根据地。但申秋成等一批龙潭根据地本土人游击队骨干，不完全赞成汪

克明的一些极端“恐怖”斗争想法。1933年7、8月间，中央通过阆南中心县委，恢复了四川省委同红四方面军中断近一年的联系。省委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要求，指示三台中心县委来自通南巴苏区的汪克明直接负责。盐亭城内联络站是“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联络人喻殿臣，盐亭三岔河人，其时是在盐亭北街“恒丰泰”绸缎铺当管帐先生，与富村驿区委（1933年底省委才决定划归三台中心县委领导）联络站的赵济舟是同乡关系。

汪克明被敌人逮捕也很蹊跷，因为汪克明说，他1934年5月去龙潭，正是这个赵济舟带他去找喻殿臣，先被敌人逮捕，告密了他，他才后被捕的。而赵济舟告密他，并没有告密他是中共三台中心县委的书记，也没有告密他去龙潭根据地的革命计划，所以敌人对他看管不严，并且不押送他到三台田颂尧军部，而是押送他去绵阳。由此他才在绵阳顺利逃脱，1934年6月，他就又才自个到的龙潭根据地，领导的迎接红军到来的武装暴动，和“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

汪克明说他之所以找赵济舟带路，因为赵济舟也是三岔河人，与喻殿臣是老乡。另赵济舟是富村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南部县禁烟委员，而且是他1933年11月三台白色恐怖严重时期就增补的三台中心县委委员。奇怪在盐亭城内外的联络站，还不止喻殿臣“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一家。在喻殿臣站附近，还有范洪先（第一任特支书记）的家。范洪先是虞政国的入党介绍人，范洪先离开盐亭到遂宁，任中共遂宁特支委员后，是范洪先让虞政国作的第二任特支书记。当然汪克明之所以不找范洪先和虞政国，是汪克明到盐亭之前的1934年2月14日，范洪先在盐亭城内的家中被敌人逮捕，谁告的密，不知道。

其次在盐亭城外，还有白塔沟联络站，这主要是护送重要人员的往来。汪克明作为整个川北地下党的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工农前卫团”的团长，重不重要？汪克明自己心里应该明白。白塔沟联络站距盐亭县城3公里，是刘仰高私人的宅院。此地后山山高林茂，有小路可绕开城区，直达大兴场潼保马路，敌人来抓人也容易逃脱。再说龙潭大水磨联络站，联络人胥伯安，是龙潭区委成员。汪克明到龙潭革命根据地，可以不经盐亭县城，直接从三台经射洪地界抄近路到龙潭。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汪克明与申秋成存在政治、理论的矛盾，影响到他对很多人的不信任。而汪克明与在川陕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或受张国焘蒙蔽的人，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可而知。

汪克明是中共潼川中心县委书记余宏文调回省委，省委先后派汪克明、郭仲纯、袁牧华、翁国

强、刘仰高到三台开展农运和军事工作，汪克明才任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的。但应该说，张国焘是认识盐亭人刘仰高的，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刘仰高任过红六军参谋长。他回盐亭指挥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有足够的力量。但刘仰高和赵济舟一样，只是增补为三台中心县委的一个委员，负责白塔沟联络站的地下党的交通员工作。当然这个工作责任重大，备受考验，出了差错，追究起来一点也摆不脱。这也许皆因刘仰高与张国焘，类似申秋成与汪克明，存在有政治、理论的矛盾。

而奇怪的是，1934年5月汪克明去龙潭，因赵济舟告密被敌人逮捕，但赵济舟告密并没有暴露汪克明的真正身份，让他在绵阳顺利逃脱。1934年6月汪克明又回到盐亭继续活动，这时却把刘仰高转移成都，不让刘仰高留在盐亭影响汪克明的工作。1934年10月汪克明在龙潭地区组织抗捐，再次被捕后，制造了震惊盐亭革命老区历史上的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即何增甲、申秋成“叛徒案”。原因是申秋成与汪克明存在的政治、理论的矛盾。但在汪克明夺权改组申秋成的政委自己当团长，指挥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实践时间里，何增甲作为游击队原来配合申秋成政委当的大队长，虽改组在新的“工农前卫团”农民武装还能任下面的一个大队长，他却渐渐发觉汪克明指挥中的“左倾”盲动，不适当当时龙潭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从原先在申秋成与汪克明之间保持中立，汪克明也感到何增甲转而明显支持申秋成。因为何增甲常拿申秋成原先游击队的办法，向汪克明提建议。

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先生说，何增甲、申秋成“叛徒案”，是指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后，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原先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向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投降，被县保安大队收编，派到安县去同田颂尧的29军一起参与“剿共”。由于不卖力，很快又放开盐亭。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这支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回盐亭后，很快“反水”，开进龙潭附近石狗场（今日的五龙乡）的大山区，和追捕他们的田颂尧的29军周旋打游击。后被田颂尧的29军在1935年的围剿中，捉住何增甲、申秋成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集体屠杀于塔泥坝（高灯镇）。隐蔽下来的党员仍继续坚持革命战斗，但到年底，党的活动基本停止，绵阳革命转入低潮。

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也有人说是，1933年11月盐亭县委书记何仕民及杜仕仪等人被捕，1934年春随着盐亭县委书记何仕民的投敌，亭县委成员全部被捕，盐亭交通联络站和情报联络站活动中断。1934年4月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准备去盐亭接收中共富村驿区委，

1934年5月同他一路的赵济舟叛变，汪克明在盐亭城内喻殿臣的“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被捕。汪克明被敌人押送到三台“军学研究会”监禁，因赵济舟并没有完全告密他的身份，而他却自己叛变。1934年6月敌人与他策划，假借押送汪克明到绵阳的路上，让他择机潜逃回盐亭龙潭地区，共灭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1934年10月，汪克明通知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到龙潭西山坪一个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当队伍集合到西山坪时，汪克明却迟迟没有到场。在何增甲、申秋成等游击队骨干讨论筹备召开会的内容等汪克明时，才传来汪克明又再次被捕，而且汪克明已经被敌人在押解送往成都途中。

汪克明被捕后告密，三台党组织活动中断，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县保安大队在石狗场龙潭西山坪，用重机枪等强大火力包围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这十分特定十分危难背景下，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员大规模伤亡，游击队地下党迅速决定成立临时特支，经过长时间的开会争论，最后由临时特支成员集体表决通过，决定利用刘仰高、何拔儒在盐亭国民党县政府和保安团县保安大队的关系，假以愿意集体被县保安大队收编的条件，来解决脱围；让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不是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以及一些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安全离开曾经生死与共游击队，自谋生路。这就是刘泰焰说法的何增甲、申秋成等人1934年冬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又“反水”的来历。这里的真假，何增甲和申秋成等人的“叛变”，敌人制造有“档案”；汪克明后来给组织也有很多能说“清楚”的材料。何增甲和申秋成等人已经就义死了，没人为他们说清楚。而汪克明还活着到天年，他有关系网保护。

是否因地方党史不能联系“十次路线斗争”讲在基层的反映，盐亭本地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在1934-1935年间，与来自通南巴苏区的汪克明执行张国焘路线

存在政治矛盾，使汪克明假借被捕掩盖他的叛变告密。在这个特定时期，何增甲和申秋成带领的游击队遭受川内军阀敌29军的残酷清剿，被包围后，游击队地下党成立的临时特支组织决定，通过找关系营救，假借愿意集体收编，以保全这支武装。但当困境解除后不久，这支队伍又集体突围重新进行革命斗争。这使敌人恼羞成怒，不遗余力进行捕杀；在高灯镇遭大屠杀的那300多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来的。正是这种大屠杀，194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的地下党、游击队基本被扑灭。1945年后重建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盐亭本土在成都、绵阳等地读书参加地下党的人，回县里才重新恢复的。在通南巴苏

区时，汪克明是否就认识李井泉？不清楚。但李井泉政委杀回四川后，从对汪克明的处理，看来是欣赏汪克明的。应不应该弄清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的真假？还盐亭革命老区人民一个公道和清白？也许就是何开文书记说困难的来历。

据原盐亭县档案局赵天民局长说，盐亭县档案局保存的有关何增甲、申秋成的13个卷宗，他看过。13个卷宗看起来很多，但内面的纸张写的是毛笔字，字很大，一页没有多少字，像是口供。而有些卷宗保存在公安局，可能烧毁的一些。

总之，汪克明却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1934年10月汪克明被捕后，叛变没有？出卖过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没有？这次他是如何逃脱的？1936年夏他登报脱党？现在组织有没有对他进行过审查？解放后他顺利地参加工作，为什么对他那么宽松？其实从盐亭革命老区历史上的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是1949年李井泉书记带领解放军入川，1950年主政四川才开始处理和决定下来的看。这是否与汪克明不断以原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向李井泉书记或组织申述辩解摆脱自己的责任，说是申秋成、何增甲等共产党员“告密”他，他才被捕，没遭敌人所杀。而申秋成、何增甲等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之所以被敌人包围后“投降”，是没有按照他汪克明中心县委书记当时的组织规定：“枪弹战斗，人亡枪亡”的战斗精神，变成的“胆小鬼”。被收编后，又参与敌人到安县“剿共”，就足够证明他们是“叛徒”。所以他们后来的“反水”，是假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追捕屠杀，是不值得同情的。他们的死，换来让他汪克明改变了叛徒的面目，他汪克明被捕不投敌、不告密、也不死，让历史、党史大书特书这才是“真的”。再人云亦云。

汪克明达到了目的。盐亭教师“山笋”读了历史、党史，不是歌颂他汪克明“顽强文俊勇斗争”、“虽九死一生而未叛党”吗？有何根据？今天写的历史、党史，都讳莫如深。这是盐亭的悲哀。当然，何增甲、申秋成带领的龙潭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在龙潭山沟里秘密集合开会时，被敌人用强大火力包围，游击队地下党成立的临时特支的组织决定，后来得没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没有？或者他们在骗取敌人收编脱围后，向上级组织补报过临时特支的组织决定没有？或者补报了，汪克明书记认不认可？李井泉书记认不认可？这都是天大之谜。

其实《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收录地下党领导人的44人，其中盐亭的刘仰高、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侯伯英、袁诗

尧、虞国政等 8 人；《中共绵阳市志》归为“叛徒”的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等 4 人，认真说来其中不是“叛徒”的刘仰高、侯伯英、袁诗尧、虞国政等 4 人，在 1950 年解放后，刘仰高、虞国政等 2 人也被定为“叛徒”或“特务”的。《中共绵阳市志》没有归为“叛徒”，一部分是靠奇迹般地活下来的虞国政自己说清楚的。1980 年代，笔者在盐亭县科协工作。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虞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笔者就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 70 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

这是 1983 年至 1984 年那一两年，虞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笔者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他叫虞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的新龙乡，回家翻山很累，路过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他与刘远驰认识。虞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 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 20 多年刑，1980 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笔者问他，成都解放为什么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 1933 年 5 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听虞国政说曾是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1963 年就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的笔者，在他到县委组织部回来路过时，遇见都要请他到到科协的办公室坐。但他主动说的事情都是关于他自己的，和盐亭县党史办江渭川主任写的文章差不多。回忆起来总的是，1929 年四川军阀为修建大巴山区“反共设防公路”潼(川)保(宁)段，令盐亭县预征田赋征至 1941 年，筑路所需口粮、柴草、竹木、工具等，全部摊派到户，筑路工役也由各乡轮换抽调，苛捐苦差，民生涂炭。潼保马路盐亭至潼川(三台)段公路在 1930 年 1 月开工，他新当盐亭县地下党特支书记，为贯彻潼川(三台)中心县委开展工运的指示，1931 年 3 月他决定在潼保马路开展工人运动。他到工地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他利用当建修潼保公路监工员的公开身份，成立了中共潼保马路盐亭段支部，并兼任书记，很快使大多数民工成为依靠对象。从 1931 年 6 月开始，在他和许本达等的领导下，发动

组织了两河附近的金鼓岩，县城附近的渡船嘴、沙河铺，大兴附近的蒙子树等地的修路工人大罢工。

金鼓岩的大罢工，有 3000 多筑路民工热烈响应，附近农民和场镇居民也赶来声援。罢工第二天，国民党县长刘子才来到马路工地，立即被罢工的民工们团团围住。民工们怒气冲天，刘子才被迫答应，每天增加工钱 400 文。罢工斗争获初步胜利。金鼓岩路段完工后，转到大兴场、蒙子树路段施工，他又团结轮换来的筑路民工中的一批积极分子，在 1931 年 9 月开展 2000 多筑路民工的第二次罢工斗争。潼保马路民工两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也影响和推动了盐亭农民革命运动，给了反动官僚以沉重打击。1932 年中央四中全会后，张国焘被派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他的“左”倾冒险进攻变为“右”倾退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迫使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

1932 年 12 月至 1933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 29 军田颂尧的川北防线，粉碎四川军阀的围剿，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大苏区。1932 年 12 月，中共四川省委派余宏文(陈伯峦)接任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发布了《为工农红军占领通南巴告农民书》，号召粉碎国民党军阀的诬蔑欺骗，开展支援川陕苏区的活动。四川军阀田颂尧为消灭红军，向临近根据地的盐亭民众大量预征“剿赤”经费、粮食和战略物资，同时派部队“清乡”，搜捕革命分子。1933 年他领导的中共盐亭特支根据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因势利导的指示，以盐亭龙潭子地区为中心开展的抗丁、抗捐、抗粮、抗债，波及到龙潭、玉龙、三元、麻秧、三星、城厢、毛公、章帮等全县 20 多个乡镇，参加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组织达数千人地，配合和支援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 年 5 月，汪克明领导三台中心县委迁入中共盐亭县委和龙潭区委的所在地后，他的身份暴露，离开盐亭。虞国政说以后的事，他不很知道，只知汪克明二次被捕后，三台中心县委及所属组织被完全破坏。

听虞国政说来，他曾经为党做过一些事。但我们没有调查，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例如 2002 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附录的“人物简介”中，虞国政的词条下，记载有虞国政 1934 年 11 月被国民党逮捕过，这和汪克明逮捕有关吗？但虞国政没有向我们说起这件事。而《中共绵阳市志》也没有说他是如何出狱的？叛变过没有？我们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我们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他 1950 年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 20 多年刑，如果是冤枉，为什

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是第二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

虞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苦。他绕开我们的话题，说出的话，使我们大为惊讶。他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盐亭县人民政府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已经躲过了盐亭的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虞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十多个。

也许范弘先就在虞国政说的那十多人之列。因为《中共绵阳市志》归为“叛徒”的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等4个盐亭人中，范弘先是唯一一只注明有一个死亡时间的，而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连生出与死亡时间都没有注明。但何登甲1935年死于大屠杀是确定的，而党史志书却哑声。那么张友志、何什民是否也在虞国政说的那十多人之列呢？我们不可而知。对于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等4个盐亭本土人，在盐亭本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被《中共绵阳市志》归为“叛徒”，但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在了解访问龙潭革命根据地的老人中，张友志、何什民、范弘先，是不是叛徒，没有人说他们不是，也许对他们不了解。而申秋成和何增甲，作为盐亭革命老区历史上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实际创始人，就非常知名，对他们和跟着的那300多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在高灯塔泥坝的英勇就义，都表示深切的怀念。没有说他们是“叛徒”的，可见党心在人心。

那是我们1962年上盐亭县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笔者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班长是杨崇汇，他带领我们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这首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梓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老区史。但1964年传来说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惹了风波，已被停映，当然也影响到了不再提写《梓江怒潮》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更清楚电影《怒潮》为什么被批判？现在想来，杨崇汇那时为什么对《怒潮》情有独宠，原因也许杨崇汇是从龙潭中学1962年初中毕业，升入盐亭中学高中的。他的家在盐亭县高灯镇三河杨家沟（今联盟村六社）。对1925-1935年期间梓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事情，1960年代在他家乡和龙潭中学地区上了

年纪的人中，是尽人皆知。后来杨崇汇先生成为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副秘书长。还先后曾任重庆医学院团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重庆市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中共雅安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而笔者之所以那时就对盐亭革命老区史感兴趣，也因出生在梓溪河龙潭下游的天垣地区。1950年解放才五岁，看大人们对共产党来了的高兴劲头，也跟着翻身的穷人去跳秧歌，打歌颂共产党的金钱板。

由此也听到很多梓溪河畔地下党的故事和评论。例如，大人们说邻居的马么婆，娘家的一个弟弟在盐亭读书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敌人逮捕，用“烧火背篋”的酷刑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虽然把他保释出来，但回家后不到一个月，还是死了。而且说马么婆的丈夫，也因参加地下党，被敌人害死的。还有翻身的穷人说，当时游击队晚上蒙面抄一些地主的家，很“恐怖”。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大人们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了。模糊地意识到个中原因，是1958年到1961年在盐亭玉龙区中学读初中，同学中胡佑德是全年级学生中一直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但毕业时却没能考起学校。问他是怎么回事？胡佑德说，他大伯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脱过党；虽然人早死了，但仍影响到他升学。胡佑德是改革开放后，直接从初中考起专科学校，毕业后才上玉龙中学高中教师的。

1980年代盐亭县党史办成立后，听说梓溪河龙潭地区群众，强烈要求建立龙潭革命历史纪念馆，但建立了又撤销，撤销了又建立，反复多次没有结果。其次是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其中的民间故事收集，就有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奇怪的是，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县文化馆的领导，说是因书出版后，上面叫这样做的，可能何增甲和申秋成等是“叛徒”。为了不把印好的书作废，只好另用笔注明“作废”。由此，我们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

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们不要管。何开文书记说，这事麻烦；以前有结论，要改也难。两位领导的意思，我们能理解。毛主席生前爱谈路线斗争，甚至在党内多达十次，即有陈独秀（1次），瞿秋白（2次），李立三（3次）、王明（4次），罗章龙（5次）、张国焘（6次），高岗、饶漱石（7次），彭德怀（8次），刘少奇（9次），林彪（10次）等。有

人说，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那里照搬过来的。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

邓小平同志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但《铁血社区》网上，有个叫“流波”的人谈毛泽东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我们是赞同的。

“流波”说：“十次路线斗争”，为党内最高层十次权力的斗争。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既然前面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等对毛泽东造成长期的打压，毛主席深知党内这些斗争的残酷无情和灾难性，所以对张国焘、王明并没有进行严厉的组织清算，还说对党内斗争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后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流波”说，前四次的“路线斗争”，与毛泽东没有多少关系；而且建国前的六次，毛主席几乎是受害者和被打压者。建国后的四次，前三次都与毛主席要培养刘邓为接班人，但毛主席得来的却是苦果。第一次，毛主席当时有意培养刘邓，高岗、饶漱石不干。第二次，毛主席要维护刘邓一线，同时保护彭德怀让其去三线。但因西南是邓的地盘，彭去后还是受到了冲击。毛主席为培养刘邓一线接班人，把天平倾向了刘邓一方。邓后来反扑毛主席，是极端不厚道的。至于毛主席与刘邓的分歧，今天看来，还是走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流波”，真是大放歪理邪说。

“流波”说“路线斗争”，只是在党内最高层。其实如他的歪理邪说，也就是下层的反映。1925-1935年梓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申秋成、何增甲和汪克明的政治矛盾，使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也是这种最高层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在下层的反映。1949年后，主政四川的李井泉书记，又把这批被敌人集体屠杀的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定为“叛徒案”。用邓小平同志说的“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按1949年后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同志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主政东北局的高岗坚持走“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斗争看，是毛主席还在考量时，李井泉书记和阎红彦副书记就倾向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一方。

也许有人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是邓小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怎么在1950年解放时就有了呢？其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最后取得胜利，得到人民的拥护？其中的道理，不但中国大陆内地大多数群众清醒，就是不搞社会主义的一些香港爱国人士早也明白。例如《北京日报》曾发表韩振峰的文章说，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时间，限定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这个命题其实在十二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早就想到了。例如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俩人的会谈非常坦诚，而且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邓小平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查良镛先生说：“我想自从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您指教。”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只是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概念的新闻，更早呢？先说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单独会见金庸？

一是查良镛后来要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二是查良镛敬佩邓小平一生的风骨。早在“文革”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时，查良镛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大抓经济建设，查良镛在《明报》上撰文支持邓小平。当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查良镛在《明报》评论中预言，他不久还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查良镛后来多次公开说：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金庸武侠小说专写元末丐帮“明教”的内部斗争，是有所影射的。而从邓小平考问查良镛：“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可知，也许早在1919年，邓小平在北京爆发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他就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活动，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考察社会主义理论时，已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准备。在井冈山邓小平与张国焘斗，解放初邓小平与高岗斗，不是偶然的。即如他后来说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写信，介绍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可见邓小平那时也能感受到共产党的组建，跟“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主题的共振联系。

其实就在邓小平重庆读书和声讨卖国贼时，因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也传到重庆，一部分先进的重庆青年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四川省重庆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之一。杨闇公1920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在重庆、成都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也带领四川投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斗争。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有苏共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可见，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也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的组织有苏共的援助，在全国影响大，杨闇公等顾全大局，主动解散四川组织，重新加入上海组织。可见解放前中国虽然还没有搞社会主义，但邓小平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已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念。

“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前后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期，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以前，很多人对“俄国红色社会主义”十分看好，那么前苏联的解体后，大多数人已经可以看出邓小平弘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所以说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不完全是从苏共那里照搬过来的。说穿了那“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下层到高层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的反映与探索。“流波”说，建国后的四次，前三次都是毛主席要培养刘邓接班，但毛主席得来的却是苦果。邓后来反扑毛主席，是极端的不厚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三次毛主席要培养刘邓接班，恰恰说明毛主席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

“流波”说，毛主席既要维护刘邓，同时又要保护彭德怀，让其去三线。但西南是邓小平的地盘，彭德怀去后还是受冲击。这也是不分青红皂白。解放后修筑成渝铁路，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四川，李井泉与邓小平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因为“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邓小平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也恰恰说明，邓小平同志也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文革后，邓小平和胡耀邦积极为老同志平反，也说明他们都认识到这点。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李井泉书记无法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相比。

解放后才制造的1925-1935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屠杀于塔泥坝，被定为的“叛徒”案，30年多年中盐亭革命老区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还蒙在鼓里。但到上世纪80年代自称是1934年前中共盐亭县委书记的虞国政，从牢里释放出来后，不断找盐亭县委领导申述辩解自己的“特务”、“叛徒”案，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党的光辉下，盐亭解放初期属于主政四川的李井泉书记能管控的大案得到一定的澄清。例子与旁证可举：

(1) 任望南(1889-1952)，又名任师尚，盐亭榉溪乡人。1928年任直隶省代理省长，1947年任江西代理省长，1948年至1949年12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临成都解放时，任望南拒绝省主席王陵基逼迫挟资一道外逃，令财政厅全体人员保护财物等待接管。1950年任望南因迎接解放，办清移交手续，一度受川西行政公署表扬。1951年任望南被押回盐亭，1952年以“反革命罪”处决。1984年经绵阳市中级法院认定，任望南支持土匪暴动不实，宣告无罪。

(2) 曾子云(1906-1951)，盐亭龙江乡人。1945年任国民党74军代理参谋长，1946年任100军19师副师长，1949年任39军副军长，1949年12月6日顾祝同委任曾子云以川中第二纵队司令回川，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王缙绪(1886-1960)，将其部改编为第三军，曾子云任军长，驻防三台、金堂等地。1949年12月14日王缙绪因收到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劝其弃暗投明的信，发出起义通电，12月22日宣布所部4.3万余人在成都起义，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至1950年元月，王缙绪将部队和武器全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曾子云等起义将官编入西南高研班学习。1951年盐亭县将曾子云逮捕回县处决。1985年盐亭县法院按“起义投诚既往不咎”政策，给予平反。

(3) 刘仰高(1893-1968)，盐亭城南街人。1928年加入中共，1929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军副参谋长兼第二师第五团团副。1930年任鄂豫皖红军洪湖红六军参谋长。1933年起任盐亭地下党交通员，护送罗世文、廖承志等省和中央领导过盐亭到川陕根据地。由于罗世文对张国焘的错误作过斗争，遭到张国焘关押，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才得到平反。1938年刘仰高在成都被国民党逮捕，1947年大赦出狱。1950年解放后刘仰高在成都被捕，1968年病逝于温江狱中。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加之虞国政在为自己申述中，也给刘仰高平反能提供部分证明，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才决定恢复刘仰高的党籍。

(4) 何拔儒(1862-1953)，盐亭榉溪乡人。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与张澜、陈润霖、杨怀中、黄兴等同学交友。1913年至1913年因陈润霖、杨怀中的推荐和邀请，到长沙四师、一师任教，与在此校读书的毛泽东有过密切交往。1926年袁思尧(1897-1928)鉴于何拔儒与留学日本回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王右木、杨闇公、吴玉章等有交流，在盐亭介绍何拔儒入党。1927年至1929年何拔儒在盐亭存古学校从教中，在学生中发展了申秋成(1904-1935，盐亭天垣乡人)、何增甲(1909-1935，盐亭八角区人)等人入党。1929年范宏先、虞国政、侯伯英在盐亭成立中共盐亭特支，申秋成、何增甲和虞国政联系上，于同年10月成立中共盐亭天垣申家沟支部。1935年申秋成、何增甲等300多共产党人在高灯被敌人屠杀，英勇就义，何拔儒怀疑是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两次投敌告密所为，产生不满从此脱党。1950年解放何拔儒涉及申秋成、何增甲“叛徒案”和任望南支持“土匪案”，能奇迹般的活出来；而几乎活到解放的1935年前入党又脱党或叛党的盐亭本土人，都被镇压，为什么？

奇迹还有1952年在李井泉书记的关怀下，已划为地主的何拔儒被聘任为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每月能拿到生活费。在盐亭比他学术名气大的成都著名“维摩精舍”的创始人袁焕仙(1886-1966，盐亭麒麟乡人)，1950年解放在成都被捕，1966年死于县外。再说四川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的有近200多人，当时也没有人享受到聘任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待遇。当然何拔儒曾交待出1913年至1913年中作过毛泽东的老师，还拿任望南作证。任望南却不能自保，有人说是当时国家副主席张澜保了他。而石云龙先生说，主政四川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李井泉书记，功劳很大，能听民主党人士张澜的？没有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何拔儒不会活下来，且能善终。

(5) 王剑清(1915-1999)，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0年上龙潭中学。1936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冀东日报》编辑组长、采通部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编委、农村部主编；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搞的“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王剑清得知情况后，她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并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

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使肿病问题及时得到纠正。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他的前任党史办主任龚荣忠同志，当时就在利和乡作党委书记。王剑清冒死如实汇报，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到了纠正。

王剑清有一个情况，是她父亲王济钦

(1868-1928，又名王明金、王用辑)，1893年考取清朝举人，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盐亭保路协会会长、四川省咨询局议员、四川省议会议员。1911年王济钦与张澜、罗伦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的政治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也是辛亥革命在盐亭本土领导斗争的骨干人物，对其子女和亲友影响很大。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鉴于王剑清是解放前1936年从龙潭地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我们向她请教《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中的难题：

这个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为了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增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干部和党员划为“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对解放后制造的被敌人1935年屠杀于盐亭高灯定的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目前《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为了维护盐亭革命老区的正面形象，树立了袁诗尧、侯伯英这两位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的革命活动的烈士，作为在本土革命活动的代表。当然袁诗尧、侯伯英这两位烈士的革命事迹得到肯定，是应该的；他们的牺牲，值得可歌可泣。但在盐亭革命老区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大批牺牲的，像何增甲、申秋成等这样的干部和党员，每个人也应该实事求是得到评价；他们的牺牲，也是可歌可泣的。更重要的是，何增甲、申秋成等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斗争的大批牺牲的党员骨干，都是袁诗尧、侯伯英在盐亭早期活动期间直接发展入党的，如果这些人全都是“叛徒”，那不是把袁诗尧、侯伯英架空，成为一种千年的尴尬和逻辑笑话？

例如《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收录地下党领导人的44人，其中盐亭8人的刘仰高、张友志、何什民、何登甲、范弘先、侯伯英、袁诗尧、虞国政。没有归为“叛徒”的4人刘仰高、侯伯英、袁诗尧、虞国政。1985年后，我们没有再看见虞国政了，他的政策落实了没有？他是否作为盐亭县党史办抢救的“活口”党史材料人物，被重视，我们不知道。但从《中共绵阳市志》的介绍看，把他从解放初定为的“特务”、“叛徒”，没有再提，而转为正面肯定。对盐亭在外地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袁诗尧、侯伯英的介绍是：

袁诗尧（1897-1928），盐亭麒瑞乡人，1925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盐亭从事地下活动。1927年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委员。1928年2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阀逮捕杀害于成都下莲池。可见袁诗尧入党不到三年时间就牺牲。而在盐亭从事地下活动，也只是在1925年入党后，才回盐亭任教育局长，期间发展过何拔儒入党。1927年1月袁诗尧就到重庆，接受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的四哥）的经组织决定的指派，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到三台田颂尧的29军军部，作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田颂尧的高级顾问。1927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又调袁诗尧到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2月被敌人杀害。可见袁诗尧入党后，在盐亭从事地下活动也只是一年多一点时间。

侯伯英（1907-1935），盐亭林山乡人。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任三台特支书记。仅是在1929年5月回盐亭帮助过建立中共盐亭特支，挂名任过宣传委员。1929年秋又去国民革命军28军二混成旅任中共军支书记。1930年6月任中共上川南特支副书记。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负责人。1934年5月任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1934年12月被叛徒出卖遭反动派逮捕。1935年1月20日牺牲于邛崃。可见侯伯英基本上没有在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和袁诗尧在盐亭有一年多还不同。

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是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王剑清同志1936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前，她读中学的榉溪河畔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她是清楚的；对其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有体验。现在对1925-1935年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的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牺牲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增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不是叛徒，就是脱党。而且

解放初，对于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多种上层路线斗争暴露的下层盐亭本土的众多干部和党员，没有坚持斗争活下来，逃脱被杀而脱党的人，也再遭逮捕被镇压。对此，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生活经历的曲折与反复？王剑清老人回忆了那段革命战争时期盐亭的群众和共产党人，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此种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

当时参加海峡两岸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有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王剑清就亲自把刘泰焰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写报告，找参加研讨会的退休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刘泰焰后来说，也不得其果。

（6）石云龙（1927-），盐亭两河区人。盐亭县政协文史特约研究员。1950年1月5日在盐亭安家参加革命工作，到1952年都在土改工作队。1953年至1979年退休前任盐亭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1950年搞土改期间，在玉龙乡下见过何拔儒老先生。石云龙对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他们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1935年在高灯镇遭大屠杀中遇害，当地亲眼目睹过被害场面的群众说他们是英勇的，在临砍头时还集体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而解放后得不到正面评价，他说，这些英勇就义的300多共产党人不会是“叛徒”，特别何增甲和申秋成就义后，敌人还把全家斩尽杀绝。

（7）路璠（1916-2003），广西都宜忻融水镇古鼎村人。原武汉钢铁学院院长。1965年笔者进大学后，就听说路璠是广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组织的地下游击队，三次参加共产党又三次脱党。所以解放后历次运动来了后，他都要挨整，过后又恢复职务。文化大革命我们亲自见到这种情况。实际解放前的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与斗争是异常复杂和困难的。如果何增甲、申秋成等能够像路璠、虞国政一样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式提出，也许他们能说清楚1934年10月在特定情况下，以同意集体被收编的条件来迷惑敌人达到脱围的问题。现在看都宜忻党史办写路璠院长，已很正面：

都宜忻地区地处广西中西部凤凰山和红水河之间，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都宜忻地区的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采取灵活战术，主动出击，取得了袭击欧洞、大塘稀饭坳激战、牛洞口伏击战、屯桃伏击战和两次占领忻城县城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都宜忻地区军民的斗志。第五团的发展壮大和频频出击，引来了敌人的疯狂围剿。在极为

艰难的情况下，第五团紧紧依靠根据地群众，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转战加马、夷江地区，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第五团北山突围失利后，都宜忻地区反围剿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1949年9月16日，中共广西省农委委员路璠进入都宜忻地区，指导第五团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大力放手发动群众，巩固老区，发展新区，重整旗鼓，扩大队伍，重振军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迎接大军解放广西”的新任务。第五团在路璠领导下，聚集失散的队伍，扩大武装，发动群众，巩固老区，开辟新

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为了做好迎接解放大军的准备，1949年10月26日，路璠在马泗乡潘村主持召开都宜忻党军干部会议，宣布省农委的决定：将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扩编为都宜忻人民解放军总队，路璠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此时南下解放军已分几路进入都宜忻地区，追歼国民党军队。都宜忻解放总队各联队、大队配合大军，协同作战。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壮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何时能写出1925-1935年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真实的党史？

9/14/2014